

闻

多



大学者随笔书系



历史动向

Wenyiduo suibi

闻 一 多 随 笔

文采、欣赏、情感、哲理结合得恰到好处，也像诗一样独具一格，耐人寻味。
闻一多深谙文艺创作之道，学术的探索和民主的思想，又使他对现实人生认识得入木三分。他的随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聞
一
多

历史动向

闻 一 多 随 笔

Wenyiduo Suibi

LISHI DONGXIA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动向 闻一多随笔/闻一多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3994-3

I. 历… II. 闻…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412 号

书 名: 历史动向 闻一多随笔

著作责任者: 闻一多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封 面 制 作: 石枕寒流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3994-3/G · 240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13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文化精神

003 “四杰”

009 孟浩然

014 贾岛

018 杜甫

030 庄子

043 龙凤

047 神仙考

059 歌与诗

070 说舞

076 类书与诗

083 官体诗的自赎

093 端节的历史教育

097 屈原问题

——敬质孙次舟先生

109 道教的精神

117 什么是儒家

——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时代声音

125 黄纸条告

Contents

- 127 悼玮德
- 130 关于儒·道·土匪
- 134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 139 愈战愈强
- 142 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的演讲
- 144 一个白日梦
- 146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 150 妇女解放问题
- 154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 157 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
- 159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 164 最后一次的讲演
——在至公堂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
大会上的讲演

文明建设

- 169 建设的美术
- 173 电影是不是艺术
- 181 《女神》之时代精神
- 188 泰果尔批评
- 193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195	诗人的横蛮
197	诗的格律
204	戏剧的歧途
207	先拉飞主义
218	文学的历史动向
223	《西南采风录》序
226	时代的鼓手
	——读田间的诗
231	匡斋谈艺
234	字与画
237	冯法祀战地写生画展观后感
239	战后文艺的道路

文化精神

>>> 闻一多 历史动向>>> 历史动向>>> 历史动向

“四 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个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一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了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

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做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贻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

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他原来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徘徊、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

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以“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诗句: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

——《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

——《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

——《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

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绀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需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边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属对能。

——《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杀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孟浩然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左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
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
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人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

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唯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意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五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

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做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听李白这番热情的赞叹，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时代多么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